

边地精神气质的审美观照

——论艾芜南行小说的文化风貌

鹿义霞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200)

摘 要: 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是艾芜一生最重要的写作矿藏, 蛮野而神奇的边地是他创作灵感的源头活水。艾芜在边地行走中尝尽了生存的灰暗和底层的艰辛, 同时也享受到了边地人文的慷慨赐予。他把笔延伸到被时代和文学所遗忘和遮蔽的又一天地, 聚焦“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 为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新的审美窗口。他笔下的边地粗粝、原始, 但也展现着无穷魅力。

关键词: 边地; 强悍与激情; 率真与自由; 文化理想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4) 04—0092—05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4.04.020

艾芜的南行系列小说不但多维呈现边地的生存图景, 更对边地的精神品格和别样气质进行了审美观照。他以新的阐释视界、新的文学审美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在他笔下, 边地的异质文化别有一份魅力与诗情, 那种生存的强悍与激情, 那种人性的饱满与自由, 那种对于平等的期许与追求, 都寄托着自己对理想生命状态的憧憬与期许。

一、血性张扬的边地型抗争能量——生存的强悍与激情

艾芜的南行系列作品中既流淌着悲歌, 更响彻着壮歌和颂歌。生存的坚韧与激情、生命力的粗犷与强悍, 在他的字里行间中有着强烈的渗透。《南行记》中存在一个坚韧的苦行者主体形象, 他直面人生、勇于抗争, 毫无怯懦之态, 多有冲击之志。其他人物虽生活状态各异却也有这样的共性: 积极抗争悲苦命运, 勇于冲击现实困境。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 大大地僭越了伦理社会中的通行法则, 展示出一种沸腾的酒神精神, 一种原始、野性的生命力量。

滇缅边地位置独特, 自然条件残酷, 生存环境落后。天高皇帝远的蛮野生态环境与血盆里抓饭吃的残酷生存境遇, 使他们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生存方

式和价值观念。随时都可能遭受皮肉之苦甚至灭顶之灾, 但他们不怨天尤人; 随时都面临着冒险, 但他们牢记适者生存、强者为王的大自然法则。艾芜边地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生存于社会的边缘, 他们在一种富于野性的生活方式中挑战生活困境, 也张扬生命本能。这些作品中, 最光彩夺目的形象就是这些生活的强人, 最激动人心的声音就是这种高昂的旋律。

艾芜在《南行记》中描绘了各具独特生活经历的流民形象, 作家用墨最多的, 是那些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的人——如《山峡中》沦为强盗的野猫子父女等人, 《我的旅伴》中冒险私贩鸦片的老朱, 《山中送客记》中以偷马为营生的大老杨, 《偷马贼》中感叹世道像岩石一样的老三, 《寸大哥》中因晚上睡湿地而烂脚的寸大哥……尽管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从事着卑微的行业, 但他们身上都蕴含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强力。强烈的生存愿望使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在象岩石一样的社会上, 找出一条裂缝来。阅读《南行记》, 仿佛可以触摸到这些人物因颠簸困顿而变得粗砺的心。艾芜笔下的人物, 多硬性而少柔弱, 多抗争而少退让, 多蛮野而少矜持, 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生命色彩,

* 收稿日期: 2014-03-28

作者简介: 鹿义霞 (1977—), 女, 河南开封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给人一种情感的激荡和力量的感染。艾芜给我们呈现的边缘化生活图景，迥异于当时文坛的主要风貌，张扬着一种血性和强力。《人生哲学的一课》中回荡着这样的声音：我总得挣扎下去，奋战下去。《偷马贼》中响彻着这样的旋律：只要裂出一条缝，我就要钻进去。《山中送客记》中以偷马为营生的大老杨向往着这样的生活：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也不完粮，碰着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在他们看来，四海为家虽然充满偶然和冒险，却也别有一份自在和逍遥。他们的生活中除了悲苦，更跳动着强悍的抗争意识与乐观色彩。

艾芜深情地阐释了边地生存环境下那种可贵的雄强与坚韧，传达出一种生命的蓬勃与激情。他以自己底层漂泊经历中的生命感悟为支撑，为我们塑造出一系列棱角分明的抗争者形象。怒江、大盈江流域烟瘴毒烈，汉人不敢于此长住，可傣族人民却在此一代代地繁衍生存。边地虽然苦难丛生却很少有熊包。文弱的落魄书生，与人间底层的三教九流一起颠簸浮沉，穷愁却不潦倒，饥饿却不萎靡，他于苦难中砥砺出顽强的性格与乐观的信念：“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1]30}即使是女子，也具备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对苦难的非凡承受力。石青嫂子在丈夫杳无音信、土地被强行抢走的情况下，发誓不管什么艰难困苦，都会拼着一股力量养大几个孩子。《芭蕉谷》中的女子，嫁了四次，四任丈夫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她之后，她毅然扛起了生活的沉重，安慰女儿看淡岁月中的风雨与生活中的变故。《快活的人》中信奉“天无绝人之路”的胡三爷总是乐呵呵，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在复杂、黑暗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以顽强的生命力感染了周围很多人。《偷马贼》中的老三是一个矮小、瘦弱、风都吹得倒的人物，身体里却潜藏着争生存的强烈愿望，在他看来，为了生存，只要裂出一条缝，就要钻进去。

艾芜笔下的边地人不愿蹲在一个地方发霉，他们宁愿铤而走险，在刀上过日子，在血盆里抓饭吃，在裂缝中求生存，也不愿听任于命运的摆布；他们宁愿浪迹天涯，挣扎在生死线上，用头颅闯开血路，也不向困难求饶。寸大哥虽然饱受走烂泥路、睡湿地方之苦，可是在他眼里，赶马人的生活，“过是过得苦，可是真够快乐……喜欢在哪里住下，住下就是”^{[1]335}，而且不管是在林子还是荒山里，不管有没有人烟，一件蓑衣，一根烟杆就可以打发漫漫长夜！在寸大哥看来，他们好似一群飞

鸟，又仿佛一群猴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游方和尚清如师喝酒吃肉，不大住庙子，喜欢走四方。《荒山上》那个跑江湖的人，不愿单调地过日子，期盼着碰见许多新奇的事情，他认为即使“有人打背后来捏颈子，也比整天打哈欠活下去安逸些！”^{[1]79}。艾芜本人崇尚漂泊，把充满艰辛与创痛、变数与新奇的漂泊当做精神的沐浴，于是，他与这些边地人产生了心理上的契合，他欣赏这种生存状态。这是边地上的活力与诗情。

小说史家杨义称艾芜的《南行记》以一种“不向社会屈服的顽强生命力去观照滇、缅边地”，给读者营造出一个“令人惊慕又令人悲愤的世界”。^[2]艾芜边地小说中的人物，生存状态多艰难沉重，甚至堪称极限境遇。自然的威胁、伤病的困扰、饥饿的造访、生活的朝不保夕、死亡的不期而遇等生存难题如影随形。艾芜以深沉而壮阔的旋律，在文本中为他们弹奏出一支支强劲的生命赞歌。那些蔑视正统、追寻自由、敢于反抗的人们，在人生的战场上无比勇敢地征服痛苦与磨难，展示出粗放、强悍的边地民风，彰显出一种昂扬的生命强力和澎湃的酒神精神。那份可贵的抗争勇气勃发出强烈的生命光彩，折射着作者的审美追求。

二、放达不羁的边地型生命气质——人性的率真与自由

于坚说：“云南大地有一种超越历史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氛围。”^[3]边地尤其如此，这里是较少受到汉儒中心文化侵蚀的地方，也是较少受到现代之风冲击的地方。在艾芜热忱的叙述笔调下，我们看到：边地很少儒家伦理道德所讲究的三纲五常，也没有严格的阶级对立；野性生命力冲击着正统意识的大堤，孕育出放达不羁的边地型生命气质。边地作为远离主流社会话语的生态空间，成为自然人性的温床。

边地人崇尚自由自在，有着对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的向往，他们消解着所谓的制度与规则，打破了所谓的客套和禁忌，在正统世界的彼岸建构起别样的世界。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反叛精神、自由意志在这里被张扬到极致。边地人物多带有粗犷而放浪的特性，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热望在他们的理念中很淡薄。在这里很少正统的礼节和繁琐的讲究，民间以自然、本真的姿态包容着他的子民。大碗喝酒的豪爽、敢于冒险的勇气、狂放不羁的粗野、执著反抗的强力、追求自由的热望共同反射着边地中旺盛饱满的酒神精神，这是为汉文化所匮乏

的力与美。《七指人》中的清如师喝酒、吃肉,喜欢游走四方,追求自由自在,全然藐视佛家所谓的清规戒律。《流浪人》中的大脚女人,身材高大、豪放大方,像男人一样吸烟,说着江湖上一些袍哥流行的话语,毫无中原女子面对陌生人的羞涩与矜持。《洋官与鸡》中的老板娘,从小在傣族地方长大,有一双比男子还长的脚,走起路来异常快捷,做事也风风火火。《荒山上》中那个旅伴不喜欢按部就班的日子,认为即使冒险走江湖,也比整天打哈欠活下去安逸些:“到处到可以打滚龙,哪还少地方喂脑壳?”^{[1]82}。《山峡中》的野猫子,恰似一朵野玫瑰。闯荡江湖的特殊经历让她身上充盈着泼辣大胆与狂野之气,敢爱敢恨,毫不扭捏做作。她没有世俗女子的机心与算计,有的是恣肆的生命活力和炽热的自由热望。《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精通滇缅界中各种民族的语言,跟克钦人、傈僳族人、缅甸人甚至印度人,都能称兄道弟。他是一个真诚、豪爽的盗马贼,不理睬所谓的官家伦理,喜欢在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中享受那份自在与惬意。《私烟贩子》中的老陈,在监狱中几进几出,却仍然只愿做任情驰骋的马,而不甘做被人驾驭的牛。边地在艾芜笔下成为狂欢化的理想空间,其自然生态其风俗人情是培育自然人性的土壤:行走在这个文化空间的男子多勇敢豪放,生存在这片热土上的女子多热辣倔强,他们把爱恨都燃烧到极致,其人性粗粝中不失纯粹。

很少伦理约束的边地,成了情爱自由释放的温床。边地女儿对待爱情热烈而大胆,很少在乎是否违背了伦理纲常。较少受到汉儒文化束缚的她们不像中原女子那样谨言慎行、看重妇道与贞节,她们身上张扬着热辣、放诞与野性。艾芜的中篇小说《芭蕉谷》即是典型的个案,它塑造了一个热辣而倔强的姜姓女子。她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乱世的荒谷中扎根生存下来,一共嫁过四个丈夫,有四个同母异父的儿女。即便如此,她仍旧无比坦然地抛头露面开店做生意,丝毫没有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流言蜚语的侵扰,这在中原文化圈内是不太可能的。相比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这个女子虽然一再改嫁,却好像从来没有过灵魂撕扯的痛苦。她和自己的几个同母异父的孩子像山间草木一样自然地生长,路人并无恶意的调侃只不过像倏忽而逝的山风。彝族男女喜欢对歌,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缺少了歌声好比吃饭没有盐巴。云南西部的五六月最有浪漫气息,水畔、阡陌间时常传来悠扬的歌声。

男女因为一时对歌高兴而相爱的事情在这里并不罕见。傣族青年晚上去串姑娘,把自己身上披的毡子向姑娘身上一披,两个人裹在一起,便边走边谈爱情;年轻的姑娘看上了谁,就发出信号到大青树下等人……他们的爱情,跃动着恣肆无忌的活力,渗透着火辣奔放的优美。

我们细读艾芜的作品会发现,他在书写内地与边地时,采用的是迥然不同的笔墨。就女性形象来说,边地的女儿多豪爽,多热辣,多自由,她们虽然生活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却也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旷放与自在。相比而言,艾芜笔下的中原女性则背负着太多的封建因袭。《回家》中丁永森在城里当司机,为同事喇叭老五诱惑,曾经多次背叛妻子。依照丁永森和社会伦理的标准,他可以乱来,妻子却不能。所以,当丁永森的妻子被人强迫受辱的事件暴露后,丈夫和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丁妻。《手》中,一个做工的长年,就因为帮忙喂猪时摸了五婶那白嫩的手。结果,五婶娘家两个哥哥扬言要带刀给杨冬生放血,杨家人商量着打烂杨冬生的螺丝拐(足踝骨)叫他做一辈子废人。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这样:用五婶的裤子做成一顶帽子,在帽子上撒泡尿,让杨冬生湿漉漉地戴在头上。《女人·女人》中,刘嫂是那样愚昧,明知丈夫把她卖了,仍旧甘愿继续受骗,以致孕期暴毙。《江上行》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边地儿女的豪爽,矜持的他们选择把感情深埋心中。《丰饶的原野》中那个绰号为锯子的寡妇,被多少人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完全没有艾芜边地小说中寡者的自由和随性。

艾芜在行文中表现出对强悍和纯朴性格的偏爱,他描写并礼赞边地人文土壤孕育下的自然人性。自然的蛮野残酷、饥饿的如影随形,伤病的侵蚀折磨,死亡的不期而遇等等生存难题摆在每一个边地流浪者面前。响马贼、山林强盗等等,在作家笔下是真实而立体的存在,不像主流意识形态中那样公式化。那些穿越山野林莽的江湖人,身上藏着粗鄙与野蛮,甚至有着种种嗜烟、嗜赌的恶习,然而他们秉性单纯,为人坦诚。为上流社会所难以寻觅的慷慨重义、重言诺轻钱财等美德,在他们身上十分淳朴地存在着。他们是狡黠与诚实、粗蛮与正直、无情与有情复杂的统一,是无法用既有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的复杂的这一个。艾芜常常以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写法,解读文化环境与人性形成的潜在关系,对这些人物投以温情和理解的目光。

《流浪人》中，“我”因缘际会地当了冤大头，替几个人垫付了饭钱。正窘迫不堪之时，发现矮汉子在口子上等着自己。大家本是素昧平生，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可是却坚持给“我”超额的数目，在他看来，钱大把来，就得大把地用去！只要用得正当、漂亮！《山峡中》以不怕和撒谎为生存哲学的强盗们，其实并不是恶的化身，他们知道我要离开时，悄悄留下了几块银元。《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得知抢的并不是富家人的马，竟主动把马放回原处。《荒山上》那位以抢劫为生的强盗，诚心诚意地给“我”讲江湖道理，粗声粗气之下是真诚的关心和体恤。在滇缅边境这样的蛮荒之地，在如此一群所谓的野蛮人这里，艾芜寻找到泥土中的纯金。他们虽然也曾参与打家劫舍，可是并没有磨灭掉内心的温情。刘西渭在《里门拾记》感叹艾芜笔下的这些人“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4]作家通过“野蛮人”野性的表层看出了其人性的内核。他们有着特别的生活体验和生存方式，看似粗蛮、残酷，却也不失一种洒脱和真实，很少世俗社会的虚套和桎梏。作家对这些流浪者不可磨灭的人性光彩发出由衷的赞美。

三、摄魂之地的文化梦寻——理想空间的憧憬与期许

文学不只是为了猎奇，不能止步于对现实人生的简单记录。艾芜无意于遮蔽边地的蒙昧与蛮野，但他看到的更多是边地的野性与伟力，是底层民间的能量与诗情。以流浪诗人的情怀去咏赞边地的原始美和生命力，呼唤强力人格和自由人性一直是 he 倾情的文学主题。那些澎湃着生命激情与乐观气质的强者充盈着作家的审美视野。艾芜在他的边地小说创作中，建构了一个丰富的民间世界。这个建构过程既是对人性意义阐释的过程，也是生命主体建构的过程，更是精神气质书写的过程。南行以及南行的故事在艾芜生命中像一串意味深长的符号，像一种精神的风向标，寄寓的是一种在路上的求索状态。怀抱着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艾芜，以自己的文字为载体，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生命状态的憧憬和期许。伴随着南行的异域风情一同展现的是其理想的生命空间。他的边地小说大部分堪称作者传奇经历与心灵体验的外化，浓缩着作者的深层文化心理。

艾芜偏爱生机勃勃的事物，常常给这里的人们配上强健的体魄。也许在如此荒蛮的环境中，只有特别强健的人们才能充满韧性地生存下去。漂泊行

旅中结识的流浪者不会没有瘦弱者、卑琐者，可艾芜崇尚和希望的，多是与野性自然相得益彰的壮汉子与蛮女子。民间侠义情结与五四启蒙思想和谐共振，共同作用于艾芜的审美选择，让他呼唤并寻求强力人格。艾芜倾心于描写荆棘丛生般的极限生存环境，倾情于塑造坚韧顽强的勇敢者和反抗者形象，极力呼唤未被苦难阉割的生命强力，这一特点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心理机制，寄托着他的文化理想。

在艾芜看来，生命的强悍与激情是耀眼的光彩，是生存的力量，是精神的飞扬。他极力塑造并咏赞边地反抗者形象，他们是作者心中的民间英雄，既彰显着社会性的反叛意义，更指向人的主体性缺失的现代命题，“暗含着国民再造的能指，试图呼唤古老民族的野性生命力量。”^[5]在艾芜的边地书写中，无论是《山峡》中的强盗团伙、《盗马贼》中的老三、《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还是《乌鸦之歌》中的青年、《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我”、《荒山上》中的汉子，其实都传达着类似的声音：大胆反抗现实，勇敢冲出裂缝，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求生存、寻活路。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以女子为主人公的几篇小说，比如《石青嫂子》、《芭蕉谷》、《一个女人的悲剧》，人物也是泼辣大胆、勇于反抗，有着超强的生存能力。这种蓬勃的生命激情与昂扬的反抗精神是作者极力赞赏和倡导的一种生存状态。作者其实是在张扬这样一种价值观：靠祈求是不能生存的，残酷的环境只欢迎强者；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像真正的人那样庄严地生活。艾芜以荒蛮的外衣传达着生活的诗意，寄寓着对苦难的审视与超越。

边地是自由释放生命激情的天地，是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天地，有其蒙昧，有其野性，有其神秘，有其开放，更有其勃勃的活力。艾芜陶醉于异域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生态，着力表现异质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于是边地就成了故土的反衬。在咏唱边地自由人性的时候，他以此为一面镜子，感慨故土周遭的一切，太古老了。所以，为了肌体的强健，需要勇敢地打上一针，输入年轻的少壮的血液。在揭示边地文化空间生存的蛮野与血性时，作者看到了汉儒文化所缺乏的酒神精神。他呼唤文化换血，试图给缺乏活力的中原传统文化开一剂重振气魄的精神良药，期盼以边地人文新鲜的质素来激活中国文化的母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艾芜以新的阐释视界、新的文学审美及深入的文化探寻表达了自

己的文化理想,寄托了自己对理想生命状态的期待之情。

也许正如艾芜的预设,边地诗意的存在方式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平台和一种充满现代性的精神超越之路。那些不为主流社会包容的无所顾忌的生命形态,被艾芜赋予了一种自然本性,并升华为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与巴赫金式的狂欢诗学。艾芜在他营造的边地生存空间里试图构造一个充满平等与诗性的江湖世界,寄寓着对平等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这个江湖世界类同于巴赫金所定义的第二世界:抖落了主流意识的精神束缚与人性压抑,颠覆了文明社会的身份系统和等级关系,解构了官方统治与封建伦理。老朱、老何、老三、大老杨他们之所以痴心做流浪者,就因为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生存方式里获得了生命飞扬的大欢喜。

在艾芜那里,边地的生活景象,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在比较中,让我们反思自身所属的文化生态。他冷静地剖析现实,在对比、参照中寻求异质文化的活力因素。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艾芜的小说世界呈现出分割为二的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他在边地叙事之外也流露出艾青式的忧郁与沈从文式的乡愁,也塑造了一系列陷进泥沼的痛苦者,比如《某校纪事》中的孟平,《故乡》中的余峻庭以及《山野》中的徐华峰,从而展示了我们民族面临灾难时的真实心声。现实太黑暗,艾芜就直接发掘出黑暗底下的不竭光源;眼前的一切太古老沉闷,艾芜就转向回忆,去描写充满生机的原野与充满火辣味道的流浪者。他以边地为另一个瞭望台,目的在

于偷运思想的天火来照亮抗争之路。

艾芜以热烈的语调诉说着记忆中和想象中的边地世界,把这里当做了他“乐观情绪的补给地”^[6],在这里找到了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诗情。艾芜钟情于边地的书写,他借用这个世界寄托自己的希望,于是野猫子们、大老杨们、马哥头们等歪人都成了他照亮现实的光源。边地成了艾芜的一面精神领地,他在那里建造心理堡垒,打造生存盾牌,传达文化理想。那种血性与激情,那种率真与奔放,既传达着作者心中的生命礼赞,也诉诸于民族灵魂激活的深层。伴随着边地风情一同展现于读者视野的,是艾芜用笔墨建构的理想生命空间。

参考文献:

- [1] 艾芜. 艾芜文集:第一卷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2]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478.
- [3] 于坚. 云南这边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47.
- [4] 毛文, 黄莉如. 艾芜研究专集 [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396.
- [5] 王光东.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化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05.
- [6] 王晓明. 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215.
- [7] 张直心. 边地梦寻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8] 冯永祺. 南行踏歌 [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9] 赵小琪. 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 [J]. 文学评论, 2004 (5): 228.

The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of Borderland's Spirit —on AI Wu 's Southbound Novels

LU Yi - 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200, China)

Abstract: Six years of wandering life in the Sou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writing deposits for Ai Wu. Pretty wild and wonderful borderland is the source of his inspiration. Walking in the borderland, Ai Wu tasted the darkness and hardships in the bottom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enjoyed the generous gift of the borderland culture. He put his pen extends to another heaven and earth that had been forgotten and obscured b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marginal people out of the trend of times. He opened a new aesthetic window for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borderland under his pen is not only crude, primitive, but also show the endless charm.

Key words: borderland; intrepid and passion; forthright and free; cultural ideal

(责任编辑:朱世龙,沈秀)